



在法老的国度

失落的文明

提起埃及，人们不由会想到金字塔、木乃伊，想到宽阔的尼罗河孕育的灿烂文明；也会翻开厚厚的史书，查阅这个古老国度的编年史，了解他们为人类文化作出的杰出贡献，欣赏他们卓越的艺术，研究他们古老的宗教和风俗。然而，有多少人知道，仅仅在一百年之前，我们对这个伟大国家文明的认识，还是一片模糊呢？

岁月对记忆的磨损是异常惊人的。埃及在历史上曾无数次遭受其他落后民族的入侵，古老的文明遭受过多次打击。公元前 525 年，埃及被波斯人征服后，其文化开始衰落，并再也没能够恢复过来。

很难找到像埃及这样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相差如此巨大的地区。尼罗河水依然

一年一度泛滥，金字塔依然屹立在沙漠中，然而人种改变了，古埃及人融入了无数征服者的人海之中，不可辨识；语言被遗忘了，古老的象形文字被凝固在墙壁上，无人释读；宗教信仰被改变了，先是接受了基督教，后来又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一员。更重要的是，历史被湮没了，面对那些被盗墓者挖出来的木乃伊，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是谁，都干过些什么。

这一切与古埃及人不曾留下他们的史书有密切的关系。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一样，埃及人也没有细心地写下自己历史的习惯。他们没有史学家，也从来不根据某一固定年代计算时间，他们似乎认为过去的事情价值不大，与其从历史中寻找经验，还不如祈祷神灵更为便当。

埃及人最早留下的历史著作是公元前 300 年左右写下的，那时埃及已经在希腊人建立的托勒密王朝统治之下。史书的作者叫曼内索，是一位埃及祭司，他受过良好的希腊教育，他的历史著作也是用希腊文写成的。由于他是埃及祭司，所以他认识建筑上的铭文，能够读懂神庙文书库中的纸草书。他最大的贡献是将他所知道

的法老划分为三十朝，并依年代排定，虽然在资料极度缺乏的情况下，许多朝代的起讫年代误差巨大，但他的划分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第一个将埃及纳入历史视野进行记载的是希腊人希罗多德（公元前 480～前 425 年）。他亲身到过埃及，在他的书中对古代埃及作过许多有趣的报道。

希罗多德不懂埃及语，因此他的资料来源除眼见的事实外，更多的来自于他人的叙述，有时这些人叙述的只是极不可靠的传说。希罗多德对埃及的记载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治历史，如关于古埃及国家最古的创建者的传说，关于第四王朝胡夫金字塔建造情况，等等。比较而言，他对公元前 7 世纪～前 6 世纪的事件的记叙要详细和可信得多。他还记载了尼罗河三角洲的自然条件，埃及人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成就及其对希腊文化的影响。

比起曼内索，希罗多德能让人们知道的东西更多，过去，人们对古埃及的了解主要是由此而来的。然而，希罗多德所记载的只不过是古埃及漫长历史长河中的点点

滴滴，而且其中有些事件的可信程度是值得怀疑的。

千百年来，历史学家们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最终只能听凭古埃及灿烂的文明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越埋越深。只留下一座座高耸的金字塔顽强地露出地面，仿佛向整个苍穹昭示自己不可抹杀的历史，等待着有一天再现昔日的辉煌。而这一天，伴随着考古学的诞生，终于来到了，虽然不免迟了一些。

考古学上发现埃及是从拿破仑一世在 1798 年对埃及的远征开始的。

拿破仑远征埃及的目的是想创立“伟大的帝国”和实现“伟大的革命”。他怀有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一般的野心，除了横扫欧洲，还要踏遍尼罗河和印度半岛。

1798 年，他率领 328 艘战船和 38000 名士兵向埃及进发。出于对埃及文化的兴趣，他的队伍中有科学家、技术员、文学家、画家以及研究东方的学者。在出发前拿破仑热情激昂地向他们布置了研究埃及的任务。

埃及文化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产生过强烈影响，因此，欧洲的学者历来对埃及文化

表现出兴趣，这种兴趣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更强了。18世纪中叶，有一些到过埃及的欧洲旅行家，开始撰文叙述那个古老的国度所保留下来的丰富古物。这些背景，正是拿破仑在他的远征军中带上了 175 名学者的原因。

拿破仑的军队于 7 月 2 日踏上埃及的国土，并打败了装备原始的埃及军队，占领了埃及的北部。与此同时，他队伍中的学者也开始了考察活动。当时的埃及，到处都是古迹，到处都是可以搬走的文物，学者们只需要在地面寻找，根本无须费力气去挖掘。他们搜集到大量的动物、植物、矿物标本以及更多的文物，取得了各种测量数据。特别是一位名叫德农的画师画下了无数画稿。

德农从踏上埃及那天起，就被那众多的废墟深深感染了，奇风异貌的众多文物使这位善于素描的人除了满怀崇敬地按照它们本来的面目精雕细刻外，无暇去表现自己的主观感受，他像一架照相机一样忠实地画下自己所看到的一切，甚至连柱石上的象形文字也不遗漏，这正好使他的画稿成为难得的考古资料。

1801 年，法国远征军被英军彻底打败，被迫从埃及撤出，学者们苦心搜集到的文物却成为英国人的战利品，被送到大英博物馆。所幸的是，这些东西的抄本或图片却保留下来，带回了法国。虽然拿破仑对埃及的远征最后以军事上的失败而告终，但在对埃及的研究上，却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远征回国之后，学者们根据手头资料，特别是德农的画稿，编成了一部巨著，名叫《埃及记述》。

《埃及记述》共有 24 册，从 1809～1813 年陆续出版，内容异常丰富。最吸引人的还是那众多的插图，精美地描绘了古埃及金字塔、神庙废墟、浮雕铭文和众多古物。过去，人们对埃及的了解不过是依据少数旅行家的只言片语。现在，埃及的古文化生动而形象地摆在了读者的面前。虽然《埃及记述》所做的全部工作仅仅是客观的展示，无法进行哪怕是最基本的解释。

这一记叙性的出版物以及带到欧洲的一批埃及文物，不单在学者中间，就是在那些稍有文化教养的社会阶层中都引起了浓烈的兴趣。当时的欧洲科学精神勃兴，正以

超过以往百倍的热情探讨着过去的时代。人们对埃及的兴趣已不再出自于一般的猎奇或者对古物的占有欲，更多的是探索文明之源的欲望。

对于大多数欧洲人而言，他们自己的历史是苍白的，当他们的祖先还在北欧的森林里猎熊的时候，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有如天边的群星相继闪烁发光。虽然这些星辰有的逐渐暗淡下去，但是欧洲人最终是这些古老文明的受益者，但如同接受一条大河的哺育的人们并不知道身边缓缓流过的丰沛的水流，汇聚了哪些遥远的源头。正是这种探索历史和文化奥秘的激情，使无数欧洲学者相继踏上了埃及寻觅法老的国度。

由于拿破仑一世的远征，一项专门的学问——“埃及学”诞生了。此时的埃及学处于初始阶段，人们只能做到热心地搜集文物、铭文、纸草文书和各种摹本。除了丰富异常的实物资料外，还知道什么呢？人们甚至无法对这些实物资料进行分析，不知道是谁、是什么时代留下来的。可惜金字塔和雕像不能说话，埃及的历史和文化依然埋没在大团大团的迷雾之中。

神秘的象形文字

古埃及人是个十分爱书写的民族，在埃及到处都可以看到象形文字——寺庙和墓室的墙上、纪念石碑上、棺材上、雕像上、箱子上、器皿上、木料上、纸草上都可见到。据说在一座寺庙里发现的象形文字之多，一个人从早抄到晚 20 年也抄不完。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大约在公元前 3500 年就形成了。它所记的语种属于古埃及语，主要的使用者是僧侣，现在发现最早的象形文字大概写成于公元前 3100 年左右，早期的象形文字又称“古体”。

为了书写方便，到中王国时期，又出现了简化了的象形文字。这种新文字通常由僧侣写在纸草上，故称“僧侣体”。公元前 7 世纪左右，又从僧侣体演变出一种书写速度更快的草书体文字，通常用于日常公文书写，因而称为“世俗体”。这三种字体一直使用到希腊罗马统治埃及的时期。这个时期，懂得

象形文字的人已寥若晨星，加上僧侣们故意把文字的意思弄得十分古奥晦涩，结果连埃及人自己也不能看懂了。公元前 3 世纪开始，象形文字逐渐被科普特文字代替。

人们以惊奇的眼光注视埃及的象形文字达十几个世纪之久。从希罗多德开始，欧洲学者大多认为它属于表意文字，或者是宗教仪式上使用的神秘符号。18 世纪欧洲学者中有种流行说法，即根据都使用象形文字这一现象，推想中国人是埃及人的后裔，或者埃及人是中国人的移民。

很明显，面对大量的文化古迹，人们却恍如雾里看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无法认识那些象形文字，它们被铭刻在文物的显眼之处，分明是在告诉人们这是打开古埃及文明之门的密码，可是能够解开这个密码的人在哪里呢？

“埃 及 人” 商 博 良

在拿破仑东征后，欧洲掀起的埃及学热潮中，有许多人立志解开象形文字之谜，

商博良(1791~1832年)就是其中一个。商博良出生于法国的洛特省，一生下来就具有明显的东方人特征，长得活脱脱地像个埃及人，后来他的同事也以“埃及人”来称呼他，但他的血缘却与东方人没有任何关系。

商博良从小就是一个语言天才，13岁就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叙利亚语、迦勒底语和科普特语，甚至涉猎了中国的古代文字，目的是看看它们与埃及古代文字之间有无联系。在他少年时代，有一天在一个学者家中看到了收藏的纸草上的象形文字，便立志要成为认识这种文字的第一个人。商博良1808年就获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第二年就担任了格勒诺布尔大学的教授，这一年他才19岁。在这个期间，他开始着手研究象形文字。

与当时所有的人一样，商博良的入手点是著名的罗塞塔碑。碑名出自发现它的城市，罗塞塔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西北部，拿破仑率军远征埃及时，他的军队在该城附近一处古埃及的废墟上挖掘防御工事时，一个士兵挖出来一块黑色玄武岩断碑，石碑上刻的一大堆古怪符号引起了大家的兴

趣，他们的指挥官布夏尔是位颇有修养的人，下令收藏起来，交给了随军的学者们。

罗塞塔碑约有桌面大小，上面刻有三段有些模糊的文字。第一段是象形文字共 11 行，第二段是世俗体文字共 32 行，第三段却是可以认识的古希腊文。三种文字出现在同一石碑上，这样的安排形式，本身也在告诉人们这三段文字的内容是相同的，这一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当时的报纸称这块石碑是通向法老的国度的钥匙。

罗塞塔碑的希腊文很快由拿破仑的一位将军翻译出来。原来是公元前 196 年由僧侣写给当时国王托勒密的一封信。托勒密成为国王后，不久就取消了神庙的欠税，对神庙实行优待政策，并提供保护，僧侣们十分感激，便立了此碑向国王和王后表示敬仰，歌颂他们的恩德。后来，由于法国远征军的失败，这块石碑和其他文物一起被弄到英国去了，它的原物和诸多的复制品吸引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许多有名的学者，翻译工作几乎同时进行着，但是谁都没能取得什么进展。虽然不断有人声称自己读懂了全部的象形文字，但是很快就被证实不过是功利之徒的

妄言而已。

商博良生活的时代正是法国大变动的时代，而他又是一位关心政治和学术自由的人，思想上更倾向于拿破仑的政权，曾受到过拿破仑的接见和高度赞赏，并且帮助忠于拿破仑的军队抗击过保皇党，虽然临阵又从城墙上脱逃，跑回去保卫他那些在炮火威胁下的手稿。结果拿破仑倒台后他被复辟王朝指责犯有叛国罪而被停职。在纷乱的事世纠纷中，他研究象形文字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在难得的安宁中时常取得了不起的成绩。

1822年，在他发誓要认出象形文字的20年后，成功地释读了罗塞塔碑和其他一些象形文字，这年9月24日，他在巴黎科学院宣读了著名的《关于象形语音学的字母——给M·达西尔先生的信》。这天被公认为是埃及学的真正诞生之日，因为从象形文字释读成功的这天开始，人们才得以超越文物的表面，从内部去认识古埃及。

商博良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大胆地转变了研究角度。从希罗多德开始，历来的学者都坚定地认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是一套表意的文字系统，即用图画形式表示某种

事物的意义和概念，就像中国的方块字一样。商博良最初也是按照这种传统去思考的，所幸的是，他意识到了自己之所以毫无进展的原因。他从罗塞塔碑上的国王名字入手，发现了象形文字实际上是表音的拼音文字，那些所谓鸟、兽、树叶、水、太阳等象形，并不表示同样的意义，而是“字母”。

商博良掌握了许多词和人物名字的正确读法，分析了象形文字的语法规则，弄清了象形文字的古体和僧侣体、世俗体之间的演变关系。他死之后，他的著作《埃及语法》出版了，后来学者在他的基础上又编纂了埃及文辞典，埃及学家们不仅能读，而且能写埃及古文了。其后考古学家在埃及又发现了腓力方尖碑、堪诺普斯诏书等文物。上面都有象形文字和希腊文，研究的结果证明商博良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1828年，商博良组织了一个考古队到埃及发掘收集古物，摹画和抄录铭文，来验证产生于自己书斋的理论。这是他第一次踏上法老的国度，当地的居民成群结队地热情欢迎他，因为这是他们见到的第一个“看得懂古代石碑的人”。

站在古老的金字塔前，他激动的心情

可以想像。其他到埃及的人会被随处可见的雄伟遗迹弄得眼花缭乱，而商博良就像是一个回到老家的人。他老练地辨认着建筑物上的铭文，识别着它们的建造年代。法老之国的历史和文化变得活生生的，焕发出青春，而在此之前，它们只不过是一堆沉默的石头而已。

由于过度劳累损害了身体，商博良从埃及回国后不久就死去了。这似乎印证了熟悉他的人的那句话：“商博良是为埃及而生的。”——他打开了古埃及之门，让人们可以在这个神秘的国度自由自在地徜徉；而他自己就像一个使者，完成使命后，就回到他来的地方去了。



象形文字被释读后，带来了持续百年之久的发掘热潮。大多数人将埃及看成一座巨大的文物宝库，想方设法到埃及去挖掘。当时的埃及政府并没有颁布相应的法律，将国土上的珍宝置于政府的保护之

下。尼罗河沿岸便成了各种盗宝者和西方冒险家的云集之地，甚至相互间明争暗斗，演化成斗殴和枪击。

最初的发掘是野蛮而又粗暴的，主要的工具是钢钎、锄头和锤子，根本谈不上对现场的严密保护和记录。遇到古墓时，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封顶打得粉碎，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得到的成果。许多考察队比盗贼更为可怕，因为后者总是小心翼翼，精心策划最省力、最有效地进入墓室的方法，而且决不把浮雕敲碎，以图把它们带走。

也有一些严肃的考古学家，他们的目的不是尽快地搞到一些值钱的东西，而是为了更多地了解古代历史。德国考古学家莱普希亚斯就是这样一个人。1843年，在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的资助下，率队远征埃及。作为一位严肃的学者，他将考古作为了解埃及历史的手段。

莱普希亚斯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在他不可能带走的東西上面周详地调查各种遗迹，并精心测量和记录。更可贵的是，他把见到的所有古物进行了分类编目，理出时间顺序，将埃及的历史看成一个整体，并将一切古迹理解为某段历史发展过程的产